



金融研究简报

第四十五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4年11月5日

冷思考，热建议：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智库热的冷思考”研讨会纪要

自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来，全国兴起了智库建设的热潮，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泛化、盲目化和过度商业化的不良苗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智库项目联合主办“智库热的冷思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批示两周年的经验与反思”主题研讨会，邀请国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对“智库热”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探讨，并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意见和建议。

智库的两级：研究和影响力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如火如荼，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泛化、盲目化和商业化等不良趋势。所谓泛化，就是很多学校、研究所都要建智库；所谓盲目化，就是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所谓商业化，就是很多咨询公司都想挂上智库的名。

詹·麦甘（宾夕法尼亚智库项目负责人）：

一、智库是什么，智库做什么？

对于我们研究中心的成果，大家所熟悉的可能是我们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为了解智库在全球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我们在过去 27 年中广泛地在世界各地收集智库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并积极与各区域的智库负责人会面。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并分享一套关于智库的结构、策略、研究和管理的最佳方案，使智库可以更好的与决策者、媒体、大众互动，宣传智库的作用，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和影响力从而赢得信任。我此次的中国之行正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研究的质量和传播的方式是一般智库大框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世界各地的智库都在研究和互动这两项工作中寻找平衡点。过去传统智库的“只要做研究、出报告就会被注意”的观念已经不再适用。在这个资讯丰富的时代，信息渠道竞争激烈，如果想要有效的产生影响力，智库必须与受众群互动。沟通的能力与沟通的内容一样重要。

研究公共政策问题、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政策建议仍旧是智库的主要工作。研究成果的质量、严谨性和可信度仍旧是智库存活之根本。如果一

个智库向决策者提供的建议质量不高甚至不可靠而导致决策失误，那么它将失去决策者的信任。另外，过去主流的观点认为智库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扮演的是设置议程、影响决策的角色，而我认为这并不是它最重要和唯一的作用。现在的智库更多的是评估政府项目和为决策者、媒体以及大众解析政策和时事。一个在亚洲虽不常见但在全球其它区域越来越多的现象是，智库已渐渐成为向政府输送人才的重要来源。在美国这种现象已被制度化，被称作“旋转门”，人才从智库到政府机构，再回到智库。我认为这已变成智库的重要作用之一。总的来说，我认为智库是思想知识和政策权利之间的主要桥梁。特别是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越演越烈，智库的桥梁作用就显得越发重要。

二、智库能够做什么？

在中国当下的智库热中，智库可以做什么，以及在加深改革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担当什么角色？给热潮泼冷水并不是贬低智库自身的能力，而是要认识到智库这种机构本身的局限性。首先，即使是证据充分、非常严谨的研究和建议也不能保证会被决策者采纳。第二，智库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研究一定会转化成好的政策。政策的制定仍旧掌握在决策者手中。最后，智库也可以在解决政府的功能失调方面起到作用。认识到智库的局限性，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是很重要的。

三、影响全球智库的几个重要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全球化和全球化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舞台上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决策者面对的是越发复杂的国际关系和问题，这对智库工作的要求也更高。智库需要及时掌握时事动态，并解析这些事件对政策的影响。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决策者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信息缺失，而是信息过量。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智库的角色。

第二个趋势是科技和科技发展的速度。科技的发展正以更紧凑、更快、

更有力的步伐迈进，变化的周期正在缩短，这改变了所有基于生产知识的机构的运行方式，这对智库提出了挑战，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科技改变了智库传递信息与知识的渠道。

最后一个趋势是政治海啸。这些海啸最开始小到不被大家察觉，但发展起来迅速席卷全球并有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这些趋势改变了我们研究分析政策和传播成果的方式。我们将不再只专注于短期或长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决策者的当务之急。许多时候他们还未完全理解形势就被迫要去应对。智库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尽快理解问题的关键并为他们做出适当的应对方案。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智库热确实要有冷思考。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不能只做研究，还要有沟通，一方面跟政府沟通，一方面跟社会沟通。智库实际上还是一个应用性的研究机构，而我们真正所谓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还是需要依靠基础性研究。所以从这点来看，我想智库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从基础性研究，到整个政策链条，包括人类社会科学，各个工程技术等，再到最后实践，这将是具有科学性又漫长的过程。

智库的基本功能是做政策研究。我们要想智库真正发挥作用，它就必须要有需求。一方面是政府，另外一方面是市场。要形成一个市场，存在不同的智库，对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并相互竞争，最后产生出比较好的政策建议。所以我想可能除了智库本身以外，还需要建设所谓思想市场或者智库市场。

关于智库的需求，我简单提几点。

首先，智库研究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国家相关部门要给社会提供各种更加开放、及时、全面的数据，这样智库才有原料加工成更加客观、

可靠的分析，这样才有可能促进智库的发展。

第二要有合理的政策研究机制。现在很多政策研究不是主要靠政府提供资助，政府资助基本很少，而中国目前的社会捐助也还很有限，所以智库也需要考虑合理的研究机制。

第三是政策沟通的渠道，包括跟政府和社会。跟社会（沟通的渠道）是不缺的，而跟政府沟通的渠道不是非常畅通，此外还需要如何将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送到高层领导人那儿的渠道，这些都需要建立有效的筛选机制。

第四是实行理性的讨论机制。中国的文化比较客气，即使是同一个桌子上大家有不同的建议，但都是各说各的，没有互相比较，分析。最后好像说的都差不多。

第五是对智库发展要有效地规制，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宽容政策。比如政府对某条政策有定论了，那智库能不能经过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将对完善政策和智库建设提供更好的条件。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在智库的问题上，我归纳七个方面：第一，我认为必须要有专业水平一流的专家；第二是研究课题要面向实际的公共政策，比如研究公共政绩；第三是要深入研究对决策部门影响比较大的政策研究机制；第四是通过媒体产生社会影响；第五是智库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要相互交流；第六是要有广泛的国际政策联系，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第七是要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或者是相当充足的调研经费。

大学里面的智库要有什么特色？首先，要有基础的研究力量或者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二，要面向实际，研究实际问题；第三，需要有学生的参与和培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智库跟学生不相关不行，所以学校智库需要思考怎么把学生资源利用起来。从本科生高年级到博士后，这

个资源其实很大。现在的在校生写那么多论文，但有几个是面向社会问题的？学生得有面向实际的头脑，我们要保证教学务实。第四，需要有专人去协调校内不同的资源，甚至社会上的资源，然后共同完成调研的任务和政策研究。最后，智库必须要出思想，如果我们（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国际战略研究方面提不出什么想法，对国家的决策起不了作用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完成任务。

智库热的起源与未来：由政策引发，要走向国际

胡敏（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副局长）：智库为什么热？首先是领导重视。中央层面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特殊意见，这里面对智库战略定位很明确，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智库现代化建设，从加强软实力的角度发挥中国智库的作用。

第二，形势所迫。当前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的复杂阶段，因而在政策选择中面临很多矛盾。决策层一直提到到底是强改革还是强刺激，包括最近央行一定程度上扩大发行量，这个波动状态对我们的经济学家、智库提出了一个挑战。未来40年，面对中等收入问题，面临“大三期”的经济社会的挑战，都需要智囊团、思想团提出战略目标。

第三，国际融合。很多美国的高端智库我们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才发现智库的重要性。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全球化的历史时期，在智库建设方面我们需要与国际进行融合，智库建设也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迫切需要。

第四，智库应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特色。

我觉得当前智库热可能导致很多问题，可能是一哄而起，参差不齐。智库所出的劳动很多并没有呈现到决策者手里。这里面参谋不足，表达不畅，导致品质多元，影响不够，又因机制多样，缺乏资源整合能力。我觉得要从四个方面来考虑：智库的属性和定位，发展智库的动力和动机，智库的构建与运营，智库的发展与未来。

（1）智库的属性。在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它首先要为国家服务，其次为社会和公民服务，最后为一定意义上的集团利益服务。智库肯定是一个非盈利型社会组织，提供智慧型的公共产品。

（2）为什么要建设智库，它的动力与动机何在？我个人认为这根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有四个层面的追求，一是要寻找大的抱负，二是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三是寻求政治经济目的。四是寻求理想，忧国忧民忧天下，为万事太平。

（3）智库的建设运营要法制化、规范化，这需要高层次、专业化、覆盖各个学科的人做好非盈利型的职业。

（4）智库的发展与未来，我个人认为当前形势下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在多元化中寻求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完全为领导所需而作出的决策，不是很好的智库作用；第二要在多取向中寻求融合；第三是寻求开放。此外，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模式，从谋我到谋兵到谋天下，今天是谋天下的大时代。还要大力借鉴国际知名的思想市场，首先就是要有公正包容自由稳定的平台；要通过产品竞争，实现去伪存真；要容许智库的失败，要创新，要公开透明，要在法制状态下运行。

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很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特色的智库就是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关键是有国际

影响力的智库。真正优秀的智库必须学会洞察社会大势，洞察世道人心，学会顺应和引导社会思想潮流，引导天下万民，借万民之伟力，为我所用。

建立思想市场 抓住国际话语权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我们在讨论智库热时，确实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中国建设智库先要考虑如何建立市场机制的问题。智库这个市场，目前购买力其实很小，跟政策相关的研究只有政府机构买，相对于有限的公共政策决策部门，作为智库的卖方应该说量很大。所以智库这个市场机制如何建设？首先要有开放性，第二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性。要达到这两个标准，收入机制很重要。

再就是这些年智库的研究成果或者信息很多，更糟糕的是有一些很低质量的信息也被搁到领导桌子上，就有可能误导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因此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信息处理、报送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应该有一定的开放度，不能太封闭，这个值得思考。

第三是最终信息的采纳，也就是说这个信息的采纳过程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专业委员会来负责、把关。这样的筛选机制，反馈机制，对于智库市场健康发展有很重要的价值。

第四是智库研究方面。我们凡说到某个领域“热”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资源、经费投入，这自然而然会引导学者集中研究比较热的问题。而当决策者真的需要信息的时候，那些信息一定是集中在热门研究领域。而我觉得，恐怕可能要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一些基础问题研究中，通过一些传统的冷的领域让它稍微温和一点，这样才能够储备一些知识、专业人才。从长远来说，这对中国可能更有帮助。

罗思义（前伦敦商业与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我的理解是，智库为解决问题而存在，这是智库和学术机构的最大区别。假如我是位经济学家，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考虑经济学问题。第一个角度是，我可以思考凯恩斯的投资函数模型是什么，并且分析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第二个角度是，假如财政部部长突然死亡，然后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那么明天我就要开始工作的话我该做什么？我认为，智库应当从第二个角度来考虑经济和社会问题。智库应该解决现实问题。

我认为，智库提出决策建议时，只能回答“是”或者“否”，并做出相应的解释。比如，当尼克松总统向基辛格国务卿提问美国是否应该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基辛格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而不能说“可以承认”或“可以不承认”。这说明智库的决策一点都不能模糊，必须给出明确答案。

我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可能只占 1%。智库应该注重的就是这 1%，并利用其所有的资源做到两件事情。第一，识别这 1% 能推进社会发展的建议，而不浪费时间考虑剩下的 99% 的想法；第二，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研究这 1% 对社会有用的建议上。所以，虽然基辛格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已经认为美国应该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但基辛格等了 20 年以后才提出了他的决策建议，因为美国社会 70 年代末才能接受他的想法。当时毛泽东也为此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的唯一任务是判断中国是否应该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虽然这个研究小组并没有被称为“智库”，但从功能层面看，这就是个智库，它的目标是利用其所有的资源针对这个问题得出一个判断：“是”还是“否”。

因为情况总是随时间在变化，智库的反映速度最关键。从目前情况分析，互联网的影响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咨询公司。当时，为了把我的建议传递到有影响力的人士手里，我必须要先将报告翻译、然后印刷、最后递交到相关部门，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现在因为有互联网，这个过程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所以，智库必须识别最重要的问题，并针对它们进行研究，因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没有时间关注太多的事情。所以，如果一家中国智库想影响最顶级的决策层面，第一个需要把握的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要把中国的现实问题作为中国智库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智库要为中国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我人生中，我曾经有过三个比较好的想法。31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包括了一个数学公式，它能够正确地预测英国保守党在所有选举中的支持率。你可能以为很多人对我的发明感兴趣，但实际上没人感兴趣。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说明，保守党在未来的影响力将下降，所以尽管证据充分可信，但保守党不允许社会讨论这个话题。这个情况一方面可以说明智库面临的障碍，同时也可以说明智库可获得的机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变化速度慢，即便智库的建议很好，社会也不可能接受所有的建议。但假如社会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接受更多的新思想。中国是社会变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这对中国的智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目前，中国已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世界银行的分析说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今年已超过了美国，这是140年以来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面对这个巨大的变化，中国智库应该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我想谈谈目前对中国来讲智库的重要性。

第一，习主席的报告里也提到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不是没有智库，而是要如何打造国际影响力。就像撒切尔夫人讲的，中国不仅能卖电视，还要输出思想。如果中国要打造国际化的智库，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工作，所以我想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国际上先进智库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紧缺国际智库的人才。

第二，当年邓小平为了搞活市场经济引进了民营机制，引进了外资，推进了不同形式的市场载体，搞活了市场。现在我觉得可能到了一个时代，那就是开放民营智库，或者是让智库多元化，包括习主席讲的社会智库参与者。社会智库在体制和机制上创新，有相对独立性，对其他智库也会产生竞争，会给中国的思想市场、政策市场带来非常好的良性的互动。30多年前需要民营资本，今年需要政策市场，一个智库百花齐放的层面对中国智库发展将会影响巨大。

第三，智库对中国可能还有更大的意义，习主席提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很好，民主决策比较难。原来基层没有发言权，但通过民营智库发出声音有助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所以我觉得建设智库就是要推动中国民主建设。此外，现在中国政府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需要政策的充分认证，这就需要智库发挥作用。如果办大事之前没有得到充分认证，就可能是灾难。

达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我想先说一个问题，实际上千万不要误解为我不赞成智库热，我觉得智库热越热越好，但是我希望它是持续热，而不是一个短暂的泡沫。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我觉得所谓的智库特色应该是建立在国家的政策制度和政策决策体系下。美国是决策文化体系的产物，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决策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跟美国显然不同，所以不能完全复制美国的经验，这是我想说

的中国特色。然后我觉得有意义的说法是好智库和坏智库，而非新和旧智库。智库只要是好就行，不同的智库加起来是一个体系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关键是中国的智库能不能适应中国自己的决策体制、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现实。

第二，什么是好智库以及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好智库我觉得就是具备两点，第一有强大的研究力，强大的团队。第二是传播，智库要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社会大众，这个很重要。在传播力和研究上，研究是根本，没有研究谈不上影响力。过去智库有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性不够，不能够独立；其次，研究的相关性不够，没有决策价值；再次，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强，对社会影响力更不强，这是过去智库的问题。但现在也有新的智库，研究力没有明显的成长，我看到更多的智库把时间和金钱放在影响力上面，而在决策权上就不够。

第三个，传播力很重要，但是传播力不是主要的。智库不是媒体，智库也不是微博微信的延续。刚刚我尝试看了一下以智库为名的微信公众号有 600 多家，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不是智库。

前面是冷思考，我还提点热的建议，第一是继续“砸钱”，第二是中国智库建设需要一个法制环境来规范，第三是呼吁各种新老智库都要有强大的研究队伍，第四是尽可能保障智库的独立性，不受官方、制度和利益的制约，第五是保证研究智库的相关性，最后要保证智库基本研究条件，比如我研究美国，如果不能研究 Google，怎能研究美国？这是不利条件。

王辉耀：刚刚讲资金问题，实际上困扰中国智库建设很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欧美智库大部分靠企业家或者是慈善家捐款，中国企业家和慈善家的捐献主要还是针对小学，救灾扶贫。实际上政策也需要扶贫。此外，

我觉得民间政策研究，需要维持，要提倡社会企业家来捐献支持智库，我们要呼吁改善中国企业家捐赠文化，包括税收优惠，这都是智库需要解决的。

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我觉得除了说要贴近一些政府的需求，我们要生产出更加对路的产品，还是要向下一步拓展，就是建立起智库和新闻传播的广泛联系，这样学科的相关知识产品才可以有效地转化。作为体制内的一家专业智库，我们在搭建一些交流平台，相对上下游所处的内外环境，在专业领域把资源整合起来，这可能是在当下比较有效的办法。

第二，对如何发挥智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做一些思考。首先，智库热也是相对的。如果对比这两年我们国家在其他领域的“热”，智库热可能更多的还是倡议及倡导，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指导意见到底是什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也没有，这跟其他某些行业真金白银的投入相比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它还可以更热一些。此外，智库的功能也是相对有限，它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对它寄予太多的期望，应对它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不是说智库热背后就存在一系列宏大的需求。

第三，智库自身的建设必须得有一个清晰定位，立足国情和实际，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我建议国家出台一些真正的扶持政策，像大家说的既有一个法制环境，也有明确支持的政策，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需要细化和落实的东西。

陈启清（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我主要想讲几点感受。第一我们确实确实感受到现在处在一个智库的大发展时代，因为

我们在党校实际上经常会接触到中国的各级决策者，我们感觉他们对于智库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的决策者已经跟 20 年、30 年之前的有所变化，他们对政策的思想需求不断增加。

从国际层面来讲，我们确实实是建立国际话语权的阶段，建立国际话语权不能完全让政府去抓，政府抓有时会遇到很大阻力，而智库可能会发挥很好的作用，这就给中国智库带来了极大的发展需求。在快速成长过程中，作为智库来讲我们首先得想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是因为资源不足还是我们自己能力有限。

第二，我觉得智库应该有更多智者的集聚。那智者和学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智者是不是止于学者？如何激励这些智者不断地产生智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种激励我想可能在三个方面很重要，（1）财务上的激励，对冷门问题的研究和支持；（2）成果认可，这种认可取决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同时也取决于研究政策和机制；（3）建立声望，这种声望对智库有很大的推动力。

第三，我觉得智库是聚焦于这个库，智库里储存的是思想和解决方案。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在理念上是很先进的，但是很多理念落不了地。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前瞻性的研究放在库里储存。

第四，政府要投入。如果我们需要建立新型智库，政府一定要投入，而投入不完全是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一种机制投入。通过创新机制，吸引各方面的资源来推动智库建设。这种机制应是决策开放机制，你得让智库学者们知道决策的制定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序，决策中的参数是什么，考量的标准是什么，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去设计相应的方案。中国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和政府的对立性很强，这种对立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中间力量，而智库就能很好的充当这个角色。

最后是扩大社会声誉。现在社会需要有一个智库排行榜，这个排行榜

里有你的研究成果，你的研究成果被多少人采纳，你的政策研究方向是什么，有没有学者可以跟你有很好的联系。我们如果能够很好的推进这些机制，智库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成就。

中国智库实况：我们还是潜力股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概念，应该将中国特色、新型这两个词分开说。中国的智库，如果从国际比较而言，确实是非常特殊的。国际智库一般有两个体系组成，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智库模型，这种智库模型就是独立于政党之外。还有一个是前苏联的模式，依附于政府，由政府建立的。中国早期智库其实大部分都是学苏联，如社科院，以及政府部门建的事业单位。

美国优势是多元化发展，通过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智库是久经考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智库都是经历了风风雨雨，有成熟的管理体制和成熟的专家队伍。前苏联的智库存在一些问题，哪怕是现在的俄罗斯智库，也是不太愿意批评政府。

所以中国现在提出的智库热，可能更多的是美国模式的智库热。一说到中国要建设智库，马上说中国要建美国式的智库。但再比较下其他国家，比如说英国的智库其实基本上都是支持政党。而德国智库和美国、英国的又不一样，德国智库 90% 以上都是由政府来资助的，尽管他们的钱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政府，但德国的智库称自己是独立的，他们跟美国对独立性的概念理解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和美国智库认为，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不能跟政府走得太近，这样就容易受政府影响，失去独立性。而德国专家认为，要保持独立性，就必须只接受政府的资助。因为如果不接受政府资助，就有可能接受企业和特殊团体的资助。如果这样

看，中国智库其实也可以成为独立的智库。

看一下世界上的其他智库，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中，与政府保持独立，同时又繁荣发展的只有美国智库。因为美国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比如美国选举制度有电视辩论。一旦电视辩论了以后，就需要听专家解读，专家其实就崛起了，而他们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就上来了。相反英国就没有，英国有很多富人给智库捐钱，这样就保证了智库能够在不接受政府定单的情况下也有资金来源。

第二个方面是，自从美国智库做了排名以后，国内很多智库，或者说研究机构都想找自己版本的排名。但一说排名就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的智库，什么样的智库才是我们应该推荐的智库。我觉得中国没有办法出现类似美国的智库，所以我们就尽量不用排名。

说到智库里面的指标体系，就会说有多少个旋转门，因为旋转门是美国智库自己认为赖以生存的成功法宝之一。但是我们反过来再看一下全球，全球只有美国智库有旋转门这个概念。当然我们中国也有旋转门的机制在里面，比如我们清华和北大有好几个学院学校的智库领导人，都去地方挂职，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特色的旋转门。我的一个态度是，中国特色其实需要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去看，他是在一个自己的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中国渴望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要建设新型智库。同时新型智库意味着很多组织类型的新型智库。

王文：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几点感受，我过去从环球时报再到人民大学，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为人民服务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累，累在哪里？四点：第一写社论，第二是跟学校打交道，第三是跟研究打交道，送内参，第四是团队运营管理，你得考虑公司职员的发展，生计。

其中最累就是与政府打交道。因为你把东西送上去，他看不上你。你没有声望，又没有金融经验，你还敢做金融研究，你的经济分析能头头是道？所以做新型智库很难。

第二，我认为智库热就是两头热，第一是高层热，第二是行业热，而中间是操作机制不畅通。中央政府和中央领导高层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智库，中国智库产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兴盛发展，但是配套设施根本不支持。投入跟不上，经济跟不上，观念跟不上，机制跟不上。分析原由，实际上像刚刚各位老师讲的，没有形成思想的竞标，或者公平公正公开的思想竞争体系。我经常说智库就是思想工程，我做的就是营销总监，把这个东西销售出去很难。

第三是建议，我觉得能不能有一个智库行业协会，对智库得有评估机制、跟踪机制，作为智库的智库，目前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没有人来做的。目前智库行业还是鱼龙混杂。开放智库体系，更重要的是文化开放。只有中国整体经济各方面开放，文化开放，技术开放，最后智库才能开放。我觉得我们的智库发展刚开始，我们现在还是潜力股，未来肯定会很好，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所以我们应是相互勉励。